

第一章 绪论

一、有关名词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 华侨、华人、在日中国人、日本华侨、日籍华人等

华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所谓定居，是指在外国已经获得该国政府允许的永久定居权，但又未加入居住国国籍者；它既包括外国政府批准的合法定居，也包括外国政府认可的事实上的定居”^①但不包括非法居留者。华人：是外籍华人的简称。“外籍华人指原是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已加入或取得住在国国籍者”^②，不包括无国籍者。

华侨华人社会：指由华侨、外籍华人构成的社会群体，简称“华社”。

日本华侨：日本通过 28 种签证对在日外国人进行管理。根据中日两国有关法律、法规 本文所指的“日本华侨”是持有“永居者”、“特别永居者”、“日本人之配偶者等”、“永居者之配偶者等”、“定居者”和“就职（详见第四章第三节）”签证的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公民。

日籍华人：即原是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取得或加入日本国籍者。

在日中国人：根据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以下简称

^① 毛起雄等编：《中国侨务法律法规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年 第 255~256 页。

^② 《侨务工作概论》北京 国务院侨办干部学校，1994 年 第 2 页。

“入管法”的规定 在日停留 90 天以上的外国人有“登录”的义务。本文所述的“在日中国人”即是指在日停留 90 天以上并履行了合法登录手续的中国公民，包括华侨和非华侨。非华侨群体中，“留学生”、“就学生（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研修生（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等签证持有者是新华侨、华人的主要“后备军”。

新老华侨、华人的区分为论述方便 本文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移居世界各国和地区者及其后裔称为老华侨、华人 而将 70 年代以后 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移居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及其子女称为新华侨、华人。日本的老华侨、华人 是指 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主要是二战前抵日并居留者及其后裔；日本新华侨、华人，是指 1972 年以后，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抵日并居留者及其子女。

（二）国民、民族、跨界人民、民族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

国民：《辞海》将“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定义为“国民”^①。学者认为，“国民是由具有共同体命运意识的人们形成的、以现代主权国家为依托的利益共同体”。换言之，国民，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人们共同体”。“在当今世界的人们共同体格局中，‘国民’是一种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其他形式的人们共同体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都为其所左右。”^②

民族：《辞海》将“泛指历史上形成的 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定义为“民族”^③。学者认为“民族”指的是基于人文特征同一性、历史文化连续性、居住地域世袭性、社会经济共同性和政治意识集体性而存在于现代主权国家内的一种自觉的人们共同

① 《辞海》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 9 次印刷，第 767 页。

② 朱伦：“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 年第 4 期，第 47 页。

③ 《辞海》前掲书 第 1805 页。

体利益单位，它包含在一定的‘国民’之中，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简言之，“构成国民组成单位的具有世居地域和集体政治意识等共同性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民族’”^①。

跨界人民：指历史文化同源和世居地域联片的跨国界而居的非政治性人们共同体。尽管他们各部分之间的共同性，可能比他们与所在国的其他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共同性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和更加引人注目，但在政治特征上则与‘国民’和‘民族’截然不同。这种人们共同体，既不能界定为同一个“民族”，更不能界定为同一个“国民”。^②

民族文化：从文化学角度看，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是^③：(1)有形文化 指物质创造部分 如工具、服饰、饮食等；(2)行为文化 指习惯行为、风俗、制度；(3)精神文化，指精神创造部分，如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概念、宗教信仰；(4)语言文化，以语言为核心的符号系统。

认同：艾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认为：“认同是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保有的自己与自身的一体感”，是一种自己与共同体的历史和未来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同时还意味着对共同体的亲和感^④。王赓武认为：“认同是归属感”；认同的界定 多半是依靠当事人的自我认定”；华人的认同因事而异”；华人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认同意识”^⑤。

民族认同：包括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徐迅博士认为：古老民族是以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习俗认同的。而现代国家需要对

① 朱伦：“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前掲文，第 48 页。

② 朱伦：“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前掲文，第 48 页。

③ 施惟达等：《民族文化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7 页。

④ [美]艾里克森 Erik H. Erikson)：《历史中的认同》五十岚武士译 东京 MISIZI 书房，1979 年。

⑤ 王赓武：“论东南亚华人认同之研究”，《思与言》台北，1992 年 6 月版，第 143~174 页。

公民提供身份，以政治的方式加以确认。在国家的政治程序中，民族身份表现为国籍（即政治认同）。但国籍不一定标明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如“华侨”“华”字表示民族属性；“侨”字表示移居外国但持有中国籍。“外籍华人”“外籍”是国籍标志；“华人”是民族属性。国籍只是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形式。民族认同所内含的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感对国家的合法性来得更重要。

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王赓武教授研究表明，认同可有双重或多重，如华人“一方面认同归化的国家，而同时保有华人的自觉”即“双重认同”，前者强调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后者强调对华人文化的认同^②。戴国焯认为，认同分为政治·法律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③；可见王赓武、戴国焯、徐迅三位教授一致认为，“民族认同内含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简言之，政治认同“主要是对政治、国家的同一性”其具体表现为国籍；文化认同是对文化、社会、种族的同一性。外来移民对住在国的认同变化往往是政治认同先于文化认同。王赓武认为，“对住在国国家的认同，开始通常只是换上认同的名称，贴上新的法律标签，最多也只是再上一层‘保证政治上的忠诚’之后，逐渐‘扩大文化领域’^④，逐渐从“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居住国社会的一体化、同化”^⑤。

① 徐迅：《民族主义》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36~39页。

② 王赓武：“论东南亚华人认同之研究”，前揭文。

③ 戴国焯：《华侨——“落地生根”的苦闷和矛盾》东京 研文社，1985年初版第三次印刷，第73页。

④ 周南京：“华人同化问题——理论与实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北京，华侨历史学会 1991年 1期，第46页。

⑤ 王赓武：“论东南亚华人认同之研究”，前揭文。

⑥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91页 转引：M. M. Gordon：《美国生活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

(三) 同化、华人化、政治认同华人化、文化认同华人化

同化：同化理论众说纷纭。《现代汉语词典》将“同化”界定为：“不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①。学术界一般认为（Park & Burgess, 1921 第 735 页）：所谓同化是指不同的人 and 群体通过分享彼此的经验 and 历史，使自己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和态度，并以此和他们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联合起来的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过程^②。阿诺德·罗斯（Arnold M. Rose）认为同化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采纳。这种采纳程度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特征可以把这个人或群体与其原先的文化联系起来，对其原来的文化也不再有任何特别的忠诚。导向这种采纳的过程即是同化”^③。

戈登（Gordon, 1964 第 71 页）提出，完全同化包含七个方面的变化^④：（1）文化模式朝着东道主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2）在基层群体层次上，外族成员大量加入东道主社会的各种协会、社团和俱乐部等制度组织；（3）大规模通婚；（4）作为东道主社会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的发展；（5）偏见的消失；（6）歧视的消失；（7）权力冲突和价值观冲突的消失。戈登还认为，整个同化过程和它的不同阶段，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上述框架不仅对衡量同化本身，而且为确认同化进展的程度，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判别标准。

华人化：基于上述学说，本文所述的“华人化”，实际上是华侨在“同化”于住在国社会的整个过程中的某些个“阶段”，是一个尚未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1264 页。

^②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前揭书 第 94 页 转引 阿诺德·罗斯（Arnold M. Rose）：《社会学：人类关系研究》（Sociology: A Synopsis of Principles）纽约 Ifred A. Knopf 出版社 1955 年 第 557~558 页。

^③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前揭书，第 410 页。

^④ 国樑：“二十世纪日文华侨华人著作选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北京，华侨华人历史学会，2000 年 2、3 期。

到“完全同化”但又在不断地同化进程中的某些“阶段”，是一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住在国人（如日本人等）的“非此非彼”或曰“即此亦彼”的“阶段”即“华人化”或曰“当地化”阶段。

政治认同华人化和文化认同华人化：根据上述认同、同化理论，本文所述的“华人化”包含两个概念——政治上的华人化（政治认同华人化）和文化上的华人化（文化认同华人化）。前者具体表现国籍上的居住国国籍化（如日本国籍化）；后者则是指华侨在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居住国（如日本）社会的日益一体化的过程。

二、国内外关于日本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状况

（一）日本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概况

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相比，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相形见绌”。不仅学者阵容不大，论著也凤毛麟角。

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情况看，以日本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主要包括：陈鹏仁《日本华侨问题分析》（台北，1977）、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83）、宋越伦《日本华侨概况》（台北，1987）、沈殿忠《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沈阳，1991）、罗晃潮《日本华侨史》、朱慧玲《当代日本华侨教育》（太原，1996）。上述专著均以日本老华侨社会为对象，着重从史学角度探讨问题。

从日本情况看，长期以来，日本专家学者虽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发表的论著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但对生活在其本国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论著却很少。以李国樑教授所列举的日本 20 世纪出版的 40 多部重要的华侨、华人专著^①为例，从 1931 年出版的日本学术界认为标志着日本研究华侨问题的真正开端的《支那民族的

^① 根据联合国最近的划分标准，发达国家包括：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扬魁孚编：《人口知识手册》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海外发展》(小林新作著)一书算起,40多部专著中,只有以下10部主要论及日本华侨、华人问题:(1)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东京,1949),(2)鸿山俊雄:《神戸大阪之华侨——在日华侨百年史》(神戸,1979),(3)戴国輝:《华侨——从“落地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和矛盾》(东京,1980),(4)斯波义信:《函馆华侨关系资料》(大阪,1982),(5)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东京,1983),(6)陈德仁等:《孙中山与神戸》(神戸,1985),(7)田中宏等:《对中国人的强行连行》(资料集,东京,1987),(8)菅原一孝:《横滨中华街的研究》(东京,1988),(9)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孙文与吴锦堂》(京都,1990),(10)过放:《旅日华侨的认同变化》(东京,1999)。其中,6部为史料研究专著,1部论述华侨经济问题,3部是华侨、华人社会现状与动态性研究专著。简言之,20世纪近百年间日本出版的40多部较重要的华侨、华人问题专著中,论及日本华侨、华人问题者有上述10部,其中仅(3)、(4)、(10)三部是现状与动态研究的论著。

无论是华侨、华人的祖籍国中国,还是华侨、华人所在国日本,有关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尤其是现状研究很薄弱,对日本新华侨、华人的研究更是空白。其他国家的学者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就更少。

(二) 相关专题研究状况

1. 有关日本老华侨、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

关于日本华社认同问题的论著主要有:(1)戴国輝:a.《华侨——从“落地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和矛盾》(东京,1980),b.《进一步了解华侨》(东京,1991);(2)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东京,1983);(3)杜国辉:《华侨华人对多样文化的适应》(东京,1991);(4)朱慧玲:a.《日本华侨认同的重新构筑——华侨社会的变貌及其未来》(东京,1993年硕士论文),b.“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日本华侨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北京,1994),c.“日本华侨社会的变容及其未来”《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36集》(东京,1995),d.“从日本华侨教育的当地化倾向看日本华侨社会的当地化趋势”《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香港,1998年);(5)过放:《旅日华侨的认同变化》(东京,1999)。

戴国辉教授在对60、7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巨变进行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华侨、华人居住国不应对华侨、华人简单地实行同化、融合、统合的政策,而应将其作为本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平等待之,多数民族应尊重少数民族华人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塑造新兴的国家形象(《华侨》)华侨、华人自身应“在确立华人的新认同的过程中,积极地致力于消除对所在国的不信任感,积极地寻求并确立与他人共生共存的积极的新认同”(《进一步了解华侨》第25页)关于华侨、华人认同问题,戴氏提出了“政治·法律认同”和“文化·社会认同”的“双重认同”观点,前者具体体现为国籍的变化,后者主要指“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因素方面的与住在国社会的一体化、同化过程”(《华侨》第23页)。笔者正是采用“双重认同”观点,考察日本华侨、华人的认同变化。

山田信夫教授在采访调查基础上,从“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的角度,观察日本华侨的同化倾向和华侨“族群”的认同变化,提出:华侨作为日本的少数民族,一方面顽固地保留着其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民族文化的淡化,无法完全抗拒日本文化的同化或融合,且同化过程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山田氏的研究结论给笔者以启迪,同时也为笔者的有关研究所再一次“验证”。

杜国辉先生通过对横滨中华学校华侨、华人毕业生(主体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的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考察台湾派系华侨、华人青年的政治、文化认同,并得出结论:侨校毕业生在政治认同华人化的同时,文化认同仍母国化。杜氏的结论以及其研究方法给笔者以很大启发。

笔者的数篇关于日本老华侨、华人认同问题的讨论,是在采访和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双重认同”观点和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Emory S. Bogardus)提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标尺,通过对不同“世代”(即不同年代)华侨、华人的归化观、教育观、归属意

识、对日亲近感等的比较，通过与杜氏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把握华侨、华人国籍与意识的动态变化，衡量华社与日本社会之间社会距离变化，并得出结论：日本华侨社会正处于急速华人化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从目前情况看，日本老华侨、华人政治、文化认同尚未华人化；但从长远来看，日本老华侨、华人社会“自然同化”于日本社会的可能性极大。

过放女士根据斯波义信教授提出的“三层论”即“表层（华侨社会史）、中层（从国际婚姻看社会构造变化）和深层（心理层面的认同变化）”，分析日本老华侨的认同变化。过氏主要通过不同世代的老华侨、华人的婚姻观和国际婚姻比例的日益提高，考察得出老华侨、华人与日本社会日益融合的结论。指出：华侨、华人与日本人之间，与其说是一方同化于另一方，不如说是在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再创出一种新的文化，在逐渐地形成一种新的认同。过氏此说与戴氏的“新认同”大致一致。

2. 日本新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状况

以新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较之对日本老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少之又少。目前尚未发现一部研究日本新华侨、华人的专著。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1)朱慧玲：a.“日本的新华侨与准华侨”《华声月报》(北京,1995 创刊号),b.“当代留日学人及其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北京,1995 年 2 期),c.“日本华侨华人文化认同当地化之态势——新老华侨华人认同之比较”《八桂侨史》(南宁,1999 年 1 期);(2)王津：《在日本中国人就职者的意识与现状之调查》(北京,1996 年硕士论文);(3)田鸠淳子：“中日间的人口移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移动与定居——日欧国际劳动与移动之比较》(东京,1998);(4)段耀中：《现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综合研究》(新潟,2000 年新潟大学博士论文)。

笔者的数篇拙论主要从社会学角度，从新华侨、华人的主要“源泉”——留学生、就学生以及日本人配偶者等的调研入手，探讨新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壮大的趋势及其原因；从新华侨、华人“法律”地位

(国籍、居留签证种类),探讨其特点和发展前景。提出:源源不断的中国留学生、就学生、日本人配偶者等的大量流入并居留,已导致日本华社“量”与“质”的空前巨变,导致日本新老华侨、华人构成比例“逆转”新老华侨、华人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不同,他们的华人化进程在“异曲同工”地进行之中。

王津从社会学角度,对新华侨、华人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就职者”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中95%是20~44岁的年轻人,75%是原留日学生,92%以上具有学士学位,52%具有硕士以上学位,近50%与就职单位签有终身雇佣契约。认为“就职者”是日本华社中文化技术水准最高、最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群体。

田鸠淳子女士从社会学角度,主要通过对东京五个新华侨、华人聚集区的新华侨、华人的问卷和采访调查,考察新华侨、华人社区的形成与特点。田鸠氏调查结果显示:新华侨、华人主要通过餐馆、杂货店或中文媒体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由职业者群体在新华侨、华人社区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新华侨、华人社区并非新华侨、华人的久留之地,不少人居住一两年后便迁往居住条件更好的郊外,而较长期居住于新华侨、华人社区者多是餐馆、杂货店、音像制品店、贸易行、华文媒体、咨询公司等以新华侨、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自由职业者群体。这里不仅形成了新华侨、华人市场,也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老华侨、华人社会的中华街。田鸠氏指出,移居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它以移民接收国始料不及的发展势头,使社区空间发生变化。冷战后的日本社会,迫于国际人口流动的潮流,在被动地变化,而日本的对应政策明显滞后于国际人口流动的变化。

段耀中博士以大量资料为基础,运用统计的方法,探讨本世纪两次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大潮,以及第二次(70年代以后的)留日大潮对新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段氏所探讨的新华侨、华人所办的华文媒体、团体的状况以及新华侨、华人的日文著书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华侨化过程。

（三）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如上所述，中日老一辈学者对日本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他们的宝贵研究，为刚刚起步的当代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也存在不足。

1.“重老轻新”倾向

在以往的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中，均未发现一部关于日本新华侨、华人的专著。这种“重老轻新”倾向，与日本华社的新老构成比的“逆转”不相适应，与新华侨、华人的迅速崛起形成巨大反差。

2.“单一群体”研究倾向

以往的研究，或者是对老华侨、华人社会，或者是对新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原留学生、就职者等个别群体的“单一群体”研究，不足以反映日本华社“全貌”，也远远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日本华社的实际“需要”。

3.“孤立”研究倾向

以往的研究，多限于对日本华社自身的“孤立”研究，很少将日本华社置于国际人口流动的大潮中，置于发达国家华社的大框架中比较研究；更少见将日本华社中的新老两个群体，放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运用史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四）本研究的特点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对象不同。新老华侨、华人均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他们将被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2）研究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多种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综合比较研究：如对不同世代老华侨进行“纵向”比较，对不同群体新华侨、华人之间进行“自我”比较，对新老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以“纵横交错”地综合比较日本新老华侨、华人之间的同异，探讨日本华社总的发展趋势；（3）通过对日本华社的探讨，管见主要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探讨 21 世纪发达国家华社面临的课题与有关各方应有的对策。

三、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日本华侨、华人史是世界移民史的一部分，也是当代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力图从中日关系史、世界移民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近二三十年间日本华社的巨大变迁进行综合性分析、考察，并借此探讨 21 世纪上半叶，主要是 21 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整个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新课题。

（一）从中日关系史角度考察当代日本华侨华人史

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历史与中日关系史息息相关，它是中日交流史的“晴雨表”。本文第二、三章，从中日国家关系、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华侨、华人史。试沿着中日关系这一历史主线，勾勒日本华社变迁的历史轮廓，探讨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对当代日本华社“量”与“质”变的重大影响。

（二）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日本华社内在和外“量”与“质”的巨变

当代日本华社的“外在”量与质变，主要起因于新华侨、华人的激增，而留学人员^①又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最基本的来源。本文第四、五章，从在日中国留学人员入手，从中日两国社会的国际化、两国有相关政策法规的改善等角度，通过计量分析，考察当代中国留日热潮对日本华社“量”与“质”变的巨大影响。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考察日本新、老华社“质”的同异，通过对职业范围、社会处境、自我心态等问题的探讨，考察新华侨、华人的崛起。

如果说第四、五章探讨的是日本华社“外在”质变的话，那么第六、七章探讨的则是日本华社“内在”的质变——民族认同的华人化。第六章，运用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Emory S. Bogardus）的“社会

^① 本文所述在日“留学人员”指就读于日本正规大专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在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进修或从事科研活动的访问学者，即“留学”和“文化活动”签证持有者，不含在各种语言专科学校就读并持有“就学”签证的“就学生”和在日日本公司进修并持有“研修”签证的“研修生”。

距离”量表对“二战前”、“二战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生长起来的日本老华侨、华人进行自我“纵向”比较研究，考察不同“世代”的老华侨、华人在婚姻观、归化观和社团归属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以“测量”老华社与日本社会的“距离”变化。研究老华社民族认同（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异人化的”内在“质”变过程。第七章，运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登（M. M. Gordon）“衡量民族关系的 7 个变量”之理论，比较日本新老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华人化”程度”之差异，用新老华侨、华人“异曲同工”急速华人化的事实，论证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整体”处于急速华人化进程中的“论点”。

（三）从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定位”日本华社并预测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从史学角度，归纳中日双边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日本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派生出的吸纳外国人的政策）对日本华社变迁的巨大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归纳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日本改“排斥”为“吸纳”外国人的政策转变之必然。站在过去 30 年日本华社变迁的“基点”上，根据国际人口迁移“推拉理论”，预测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探讨整个发达国家华社面临的共同课题及各个有关方面应有的对策。

四、对所使用的主要资料的说明

（一）笔者的社会调查资料

1. 笔者的问卷调查资料（1~4 卷）

笔者在日本立教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90 年 4 月—1993 年 3 月），于 1991 年 10 月—1992 年 3 月以日本全国各地的老华侨、华人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设 42 个问题，内容包括：基本属性、归属意识、对侨团和侨校的评价、对在日生活的评价、对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的评价、对加入日本籍的态度（见附录一：朱慧玲问卷调查样本）。问卷发放方法：通过侨团负责人代发，笔者亲

自参加侨社活动当场发放，向朋友邮送或面交。总计发放 1 040 份，有效回收率 31% 计 321 份。该问卷调查结果归纳为四卷：(1)朱慧玲日本华社问卷调查基本属性（一卷），(2)朱慧玲日本华社问卷调查单项选择结果（二卷），(3)朱慧玲日本华社动态调查复数选择结果（三卷），(4)朱慧玲日本华社动态调查不同年龄组意识差异（四卷）。

2. 笔者的采访调查资料（1~2 卷）

笔者在日留学期间，在日本全国各地，参加华社各种大型活动 30~40 次，对 30 多个主要侨团和 4 所侨校的 100 多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个别采访调查，形成“朱慧玲个人采访调查记录第一卷”（见附录二）。1992—2001 年间，笔者先后赴亚洲的日本、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菲律宾、等国，赴欧洲的法国、英国、荷兰、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俄罗斯、土耳其，赴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埃及等数十个国家华社实地考察，采访了数以千计的各界华侨、华人；此外，利用接待来访客人的机会，采访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众多国家的新老华侨、华人社团的负责人、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数以千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朱慧玲个人采访调查记录第二卷”。

（二）他人的社会调查资料

1. 杜国辉氏关于横滨中华学院毕业生的问卷调查。

1989—1991 年间，日本横滨中华学院院长杜国辉在日本丰田财团资助下，以台湾派系的日本华侨学校历届毕业生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共向日本历届华侨学校毕业生邮送或面交问卷调查表 698 份（其中横滨中华学院毕业生占 77.5%），回收 399 份，横滨中华学院毕业生占 75.7%，回收率 57%。杜氏问卷共设 92 个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属性、对母校（华侨学校）的归属感、婚姻状况、民族文化保有程度、职业和生活状况等。

2. 王津关于“就职者”的问卷调查

王津在日本神奈川大学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课程期间，为完成硕士论文《1978 年以来中国赴日并在日就职人员的情况

调查》，进行了问卷调查。1996年6—7月，王氏通过数个日本关东地区的中国人“就职者”团体和朋友以1978年以后抵达日本且当时持“就职”签证的新华侨为对象，以邮递方式向400人发送了问卷调查表，回收129份，回收率32%。调查对象的75%是原留日学生。调查共设17个问题，涉及就职、子女教育、生活满意度、社团归属、交友等问题。

（三）日本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

1. 日本财团法人入管协会编历年《在日外国人统计》。
2. 日本财团法人入管协会编历年《国际人流》。
3. 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编《出入国管理》，东京，1987年。
4. 日本财团法人入管协会编《出入国及难民认定法》，东京，1990年。
5. 日本财团法人入管协会编《外国人入国、滞留、登陆手续手册》东京，1990年。

（四）日本的中文报刊资料

据统计，日本华侨、华人在日创办的中文媒体总数逾百家，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中文报刊有30~40家，其中的十几家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着发行量稳定增长的势头，占据着中文读者的主要市场。《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东方时报》和《留学生新闻》，被称为日本新华侨、华人社会的“四大报刊”。本文所使用的关于新华侨、华人情况的大量资料数据，除上述日本官方、半官方出版刊物以外，主要来自这“四大报刊”。

第二章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的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

第一节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与 早期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

一、中日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历史回顾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华侨、华人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载体，从中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中日文化交流与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将中日两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的基本轮廓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代，十个时期^①。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从上古到 19 世纪初，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6 世纪（中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的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此时期，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的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第二个时期：公元 6—9 世纪 中国的隋唐时期 日本

^① 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第 4~9 页。

大和后期、奈良时代、平安前期），此期交流方式有使节往来，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的内容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涉及精神文化和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的交流。第三个时期：公元 10—14 世纪中国的五代宋元时期日本的平安后期、镰仓、室町前期），此期交流的方式多表现为民间贸易、僧侣往来。第四个时期：公元 14—19 世纪初中国的明清时期日本的室町后期、安土桃山、江户时代）此时期交流方式多样化既有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的是精神文化。如书籍、儒学、美术、书法、医学的交流。总体而言，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百余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40—1871 年（中国清代，日本江户末期、明治初期）为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交流的主要内容是书籍、文学、艺术等。反映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时期：1871—1894 年（甲午战争）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领馆，为两国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频繁，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第三个时期：1894—1919 年（五四运动），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不少中国官员、学者赴日考察，日本有不少教师、学者来华。交流内容广泛，教育和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第四个时期：1919—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此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长达 15 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总体而言，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和内容都比古代有发展，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取向更多的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有密切的关系。